

東西方文化解剖



彭兆荣
陈向秦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东西方文化解析

彭兆荣 陈向秦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东西方文化解析

彭兆荣 陈向秦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6号)

贵阳市花溪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10 千字

印数 1—3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6月 第1次印刷

ISBN7-80583-152-1/G·151 定价：3.80元

前　　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站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历史交接的关口，我们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抓精神文明。我们党在制定新的历史时期宏伟战略目标时，也把“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首先就要求我们了解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两个指向：一是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检讨；二是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参照。没有这样的眼光和胆识，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完成新时代的战略任务便不可能。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347～348页）。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它除了指科学 技术、生产资

料、生产方式、生活水准的现代化之外，还要求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纵然引进一些最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仍无法获取现代化的效益。人的现代化包含着民族文化素质、人的素质达到一个历史的层面。具体内涵包括文化观念、教育水准、思维形态、生活节奏、伦理规范等等方面。以现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来看，诸如十一亿人中有两亿文盲和半文盲；人们仍执著地奉行着“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和着传统的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奏；人际之间照样存在巨大的“内耗”现象等等，都是与现代化的实现相抵触的。毫无疑问，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重要指标。要达到这项指标，其难度甚至远远大于其他的现代化指标。

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于现代社会从来就存在着两种潜在的价值趋势：一为动力；一为包袱。这要看该民族有没有正确审视、对待、接受传统文化的合理机制。在这方面，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例子都曾经出现过。有些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毁灭了；有的衰亡了；有的被沦为殖民地；有的发展停滞了；有的则依然欣欣向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自身，来源于缺乏一个积极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民族文化机制。历史文化素来是精华与糟粕的糅合；而且其性质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在封建社会、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中，多子多福是合理的；多生育意味着多生产，多收入。但是到了今天，地球已经超员，土地和资源都相对地匮乏；特别在中国，人口问题已经成了“民族存亡”的大问题时，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不言而喻地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民族有了合理而健全的文化机制，就能够全面地、科学

地审度历史文化，剔除糟粕，留取精华，推动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就能成为一笔财富，一种动力，一股力量。反之，它就可能成为累赘、包袱，阻挡历史的发展。

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泛民族的。作为人类的财富，应该属于全人类；任何闭关自守、狭隘的民族主义都只能是“井底之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任何民族文化的闭关自守都将成为不可能。其实，文化从来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一个民族越善于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个民族也就发展越快。唐高僧玄奘“西天”（天竺）取经，历时四年，经西域十六国，取回“真经”，促进了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着崎岖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走了东方文化，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学习西方文化之精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当今，改革开放，国门敞开。一并涌入的不仅有物质文化，同时还有精神文化。面对这一切，科学的方法应是“拿来主义”。“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如果反对这旧宅子的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

来，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我们有伟大导师为我们指引了正确方向，又有鲁迅先生为我们提供的“拿来”之方法，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做这项工作。

作 者

•社会历史篇•

目 录

· 社会历史篇 ·

文化界定·文化偏见	(1)
文化人格·民族性格	(6)
门·人·仁	(11)
宗教·信仰·精神	(16)
难以变质的“文化原子”	(21)
优勉·现代化·文化变迁	(26)
等级·观念·价值体系	(34)
群体·个体·家庭	(39)
独身·生活方式·历史选择	(44)
性别·角色·关系	(49)
人口·忧患·忧患	(53)
写在水上的文明	(57)
酒·哲学·处世选择	(62)
教育·大学·体制	(71)
历史·沉默·迷惘	(76)
动物·图腾·天鹅肉	(80)
树·绿·生命	(85)

红字·面纱·戒指·项链——徽号	(90)
无烟工业	(94)
老·暮年·生命意识	(98)
体育·妙谛·竞技	(102)
蓝眼睛里的	(106)

· 生 活 事 象 篇 ·

一说食文化	(111)
二说食文化	(115)
三说食文化	(118)
四说食文化	(121)
五说食文化	(125)
节俭·消费·文化惯性	(128)
服装诠释	(132)
服装·时髦·文化态势	(136)
行·交通·晕车效应	(140)
疾病·爱滋·文化生态	(144)
死·丧葬·民俗	(148)
拉雪兹墓地的沉思	(153)
人体·语言·信息库	(158)
说话·艺术·策略	(163)
发式——一种文化指代	(167)
婚姻·仪式	(172)
人·狗·道	(177)
颜色·造化·心态	(181)

乞丐·施舍·情态	(186)
狂欢节观感	(191)
传播·广告·接受	(196)

· 文 学 艺 术 篇 ·

巫力·音乐·情结	(201)
音乐·欣赏·个性	(205)
听歌剧引起的联想	(209)
舞蹈·艺术·?	(214)
建筑·地意·天意	(219)
汉语·背离·弥合	(224)
谚语·民风·情结	(232)
文学·诗情·外来影响	(238)
风格·气质·拿来主义	(244)
神话·源头·源泉	(251)
神话·文化·一体化	(255)
圆圈·循环结构·文化涵义	(278)

文化界定·文化偏见

“文化”是一个极不容易捉摸的东西，任何学科、门类都可以在它那儿寻找到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然而，之于“文化”而言，那些被视为极其珍贵的东西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要给它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实在是令人望洋兴叹。据统计，迄今为止给“文化”作定义的名人就有二百多位，却没有统一认同的迹象。最权威的早期的定义无疑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 Sir Edward Burnett）的断言：“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见《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99页）。这便是所谓文化的“整体论”“总和说”的肇始。后来沿袭此道为文化下定义的人越来越多。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L·White）认为：“文化是象征的总和”。苏联百科全书的定义是：“社会在教育、科学、艺术及其精神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总和”。梁漱溟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湾版第1页）。此外还有“生物质”说；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就把文化看作是某种生物现象，“文化是建筑在生物基础上的现象”（〔苏〕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译本，第241页）。文化的“广

义、狭义”说；任继愈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文化模式”说的代表人物露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把文化模式化，她认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见露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第45页）。“文化分层”说；庞朴将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面，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见庞朴《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文化圈”说：格雷布内尔（Fr. Grabner）认为“无论物质文化形式，还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某些现象，都属于文化因素，它们都分布在特定的文化圈（Cultural Circle）内”（参见《外国民族学史》第150—160页）。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文化理论和定义，可谓汗牛充栋，莫衷一是。

有两个结症决定了给文化下定义之不易，其一是“时空落差”。研究文化也同研究历史一样存在着一个“时空坐标”问题，既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带着明显历史烙印的文化事象，研究者大都站在某一个历史现实的断面上，时间上可能存在一个位置差；同样，研究对象经常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类型，研究者则站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中，空

间上也可能存在着一个位置差。此如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Culture”的内涵所指便大有出入。中国的“文化”、“文明”不外是“道”的外化，所谓“文以载道”便是这番道理。而“道”为天道，天理，可理解为“圣贤之道”。这天道、圣贤之道就是自然。《文心雕龙》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因此，中国视文化为“自然、造化、天道、伦理、秩序”的聚合，只有符合它才称得上为“自然”。一句话，文化乃自然。而西方的文化（Culture）意指栽培养育，以使生物脱离自然状态。在这里，自然状态（野蛮状态）与文化（人文意识）是对立的；人类只有超越了自然状态才达到基本的“文明”（Civilization），它强调“Civil”的“教化”、“公民”、“公约”等非自然的属性。文明就是远离自然状态的文化表述。虽然，中西方在赋予“自然”上的意义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时空落差”。

其二、文化是附丽于民族的。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作为一个地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血统代表，他经历了生活在印度人中的生活感受之后留下了一句优美的、耐人寻味的诗句：“东与西各居一方，决不会相会。”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容和涵盖，以某一民族文化，或某一“文化圈”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常常不可避免，文化偏见亦不可避免。比如在文化人类学有一个“传播学派”，其中便有一个所谓的“泛埃及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埃利奥特一史密斯（C·Elliot-Smith）便执拗地认定，全世界的文明传播中心只有一个，这就是埃及。埃及文明就像太阳一样传播“辐射”到全世界。“文化圈”、“文

化中心”等学派也大都持着“欧洲中心”学说。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造就了无数文化偏见的观点和实例，更是文化历史上的悲哀，比如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便是“白人优等”、“欧洲中心”的文化思想衍化出的悲剧。在这种文化思潮的作用下，轻者有种族轻视、蔑视、歧视；重者有殖民、战争、杀戮。多少生灵涂炭，多少种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多少文明毁于一旦。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此蒙受了多少灾难和耻辱。这些都是文化偏见的极端。就是中国的汉文化也留下了不少文化偏见的例子，比如“中华”、“中国”之名都是指四海之中，四方之中心的意思，而居住在“中国”边疆的兄弟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名称上都加了犬、虫、羊等偏旁，表示蔑视。

文化偏见不仅助长观念意识上的“中心”思想，而且还会滋生霸道行为。如果说东方是王道的话，则西方就是不折不扣的霸道。西方的文化史是一部活脱脱的霸道史。早期的希腊罗马文化时期就有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和殖民初衷；接着有亚历山大的东征和凯撒大帝的扩张；宗教上更有旷日持久的东侵；文艺复兴伴随着原始资本积累，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对异族的侵略和掠夺；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地征服殖民地和对黑奴的“三角贸易”；传教士被派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下来又出了个拿破仑大帝；而后又把矛头指向远东，印度沦为殖民地，东印度公司成立；“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火烧圆明园；日本的“锁国政策”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大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西方霸道的巅峰……。西方人之所以霸道得令人发指，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中有那些“欧洲

中心”、“白人优等”的基因的作用。

文化总要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而强烈的民族性很容易朝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迈进，因而也很容易生成形形色色的文化偏见，人类文化史就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文化研究首先要引起警惕的。

文化人格·民族性格

在文化学里，有对文化人格的设计，反映在一个民族文化中，则是对一个民族性格的普遍认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把中国人的人格设制为“丑陋”，令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能接受。对一个民族个性的看法多少总要局限在一定时代框架里；无形中也要与当时的国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政治家、学者的民族人格的宏论也要受到在那样一个情形之下的情绪影响。柏杨是这样，当年的胡适也是这样，胡适曾说过：“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要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来了，只会去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毛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见胡适《介绍我的思想》）。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阿Q”（阿Q实际上具有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的形象意义）也明显包含着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只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更透彻，更全面，更客观，因而在情绪上没有像前面两位学者那样偏激。尽管如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态中，尤其是在为本民族塑造和设计人格时，总是要受到该时期这一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气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所影响。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历